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统陈庆炎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将中新关系定位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中新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据新华社新加坡 11 月 6 日电 (记者 常勇 林建杨)6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总统府会见新加坡总统陈庆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中新关系定位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并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中新建交 25 周年之际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中新建交 25 年来,双方开展了领域广泛、层次多样、务实创新的全方位合作。当前,中新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愿同

新方共同努力,开创中新关系新未来。一是做好顶层设计,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战略沟通,继续发挥领导人引领作用,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二是与时俱进开拓务实合作,扎实推进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将其建设成为中新互利合作新的示范项目。继续建设好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两大重点合作项目。保持双边经贸合作的上升势头。双方还可以积极探讨两国企业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在第三方市场

合作模式,并在这一框架内挖掘金融合作潜力。中方也愿同新方加强在科技环保、教育人文、社会治理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三是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新加坡今年接任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聚焦发展合作,共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新双方可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和地区机制中的沟通协调。

陈庆炎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

在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和中新建交 25 周年的双喜之年来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相信此访将使中新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近年来,中新关系全方位迅速发展,两国高层保持密切往来,继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项目后,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又即将展开。这些都为中新关系注入新的动力。新中合作关系已不仅限于经贸领域,而是与时俱进地全方位发展。新加坡赞同中国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认为有利于本地区的

发展,愿积极参与有关合作。新方相信中国是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力量,愿加强同中方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也赞同东盟国家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合作。

会见前,陈庆炎在总统府广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陈庆炎和夫人到停车处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新两国国歌。习近平在陈庆炎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动。

本报讯 “解放思想,对浦东的发展尤为为重要。实践告诉我们,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浦东的现在,没有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浦东的未来。”市委书记韩正昨天上午出席“新形势下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与大家谈心交流。韩正说,面向“十三五”发展,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新要求,浦东要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新跨越,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始终把浦东的发展放在全市、全国、全球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紧紧围绕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推进各项工作。谋事在人、成事也靠人,浦东要当好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关键靠人,要以忠诚、干

思想真正解放,才能闯出新路

韩正:把浦东发展放在大背景下思考谋划,紧紧围绕国家战略推进工作

净、担当为标准,打造一支敢闯敢干、有作为、能打仗、执行力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沈晓明主持开班仪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出席。

“惟有思想真正解放,才能闯出一条新路,打开一片新天地。”韩正深情回顾了浦东开发开放 25 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说,实践告诉我们,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浦东的现在,

没有解放思想,也就不会有浦东的未来。浦东的干部必须要有大局观、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韩正说,形势在发展、实践在变化,思想认识不断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就不能停歇。

“解放思想,必须要有勇气,敢于自我革新。”韩正说,改革越是深入,就越要解放思想。我们已经到了不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发展阶段,不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就迈不开

步子,不进则退,已有的成果也会守不住,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想明白,浦东的干部更要看清楚。

“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韩正说,我们要回答好三个问题:要不要发展?怎么发展?为谁发展?答案是:必须发展、实现中高速发展,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一切发展成果必须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浦东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韩正

指出,敢闯敢干、有作为、能打仗、执行力强是对干部能力的要求,构成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识和实践。必须不断加强学习。

“从严管党治党,没有最严,只有更严。”韩正强调,任务越重,对干部越要从严要求、从严管理。要认真学习、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要在从严要求、从严管理的基础上,创造更好环境,鼓励干部大胆闯、大胆试,更多地集聚起各类人才。



新民观察

一代翻译大家草婴先生走了,有很多人去送他。翻译,也非常难得地被关注、被讨论、被打量。

一方面,家长们都鼓励孩子学好外语,因为这不仅实用,而且会从根本上拓宽一个人的眼界,会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持久的影响,就好像我们深知在这个时代,翻译并通过翻译向外学习对这个国家、对社会,仍旧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另一方面,大学外语系的老师很难或者很不好意思要求自己的学生留下来从事文学翻译,“对翻译事业缺乏鼓励和扶持的机制,缺乏必要的认可和起码的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期待有好的翻译成果,就太难了。”复旦大学法文系主任袁莉如是说。

翻译很重要

“首先我想说的是,翻译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们中国人很久以来都没太把翻译当回事。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所有的事或多或少会跟翻译扯上关系,就算是一些不相关的学科,比如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也需要通过好的翻译。”袁莉恳切地说。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黄昱宁则讲,“有一种看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于外部世界对我们的了解,好像这是一种逆差,应该扭转,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很可笑。这不是一个互相竞争的关系,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她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如果想更好地走出去,是必须以更深入地请进来作为基础的,“其实目前我们对世界的了

对翻译事业应予鼓励和尊重

诸多专家认为中青年翻译工作者亟需扶持机制

一代翻译家草婴先生逝世,身后留下的是追思和敬意。对于草婴,人们推崇的,就是他所取得的译著等身的成就,以及在翻译上修习不辍、精益求精,力臻“信达雅”境界的精神。

我们不愿意做“井底之蛙”,就非常需要翻译家。但是,当下有

微评

守住信达雅

秦丹

翻译家境界的译者太少了。翻译事业变成了由承包商、分包商、操作工组成的产业链条,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翻译作品,难免出现许多粗制滥造品,招来许多的责难和怨言。不过,在这样的

表象背后,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翻译,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活,它营造的是一个精神世界,翻译还需整个社会的尊重和欣赏。要避免“垃圾翻译”充塞我们的阅读空间,避免翻译质量每况愈下,还须相关管理部门和高校、出版社等,为“信达雅”的翻译开路,以守住这一方历代翻译家经营的精神乐土。

鼓励新译作

“高校如果能算成果的话,也许能鼓励不少人。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意识到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不能光强调科技和经济。”对于困难,身在高校的朱振武更在乎得到社会的肯定。而图书编辑黄昱宁则呼吁要切实鼓励中青年译者,尤其是新译作。她介绍说,在行内有不成文的规定,翻译世界名著这样的公版书,出版社大多可以跟译者签订版税合同,但新译的书,哪怕是潜在的诺贝尔奖作品,一般才几千册印量,出版社还需要购买版权,一般只能跟译者签订委托翻译协议,按字数结款,“收入可想而知,但这才是文化事业最需要的砖瓦。所以我呼吁,如果支持翻译事业,都应该把目光投射到鼓励中青年翻译工作者翻译新作。”此外,黄昱宁还提到,要容许年轻人犯错,“外语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的读者,在各种检索工具发达的今天,要比几十年前更容易注意到讹误,互联网时代一个翻译笑话的传播效果,远比几十部默默无闻的高质量译作更显著。”她恳切地说:“你讲一句‘翻译质量每况愈下’或许轻巧,但鼓励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在没有东西可以参考的情况下翻译新作,对我们的文化丰富、建设、传播,都更重要。”

本报记者 孙佳音

解远远谈不上深入,即便是说到外国文学,要么就是那几本世界名著,要么就是年年像过节一样关心一下诺贝尔奖。”在这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时代,其实我们正前所未有地需要对外面的世界有更及时、更准确,也更深入的认知。

翻译不好做

翻译很重要,翻译也很难做。上海大学英语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朱振武指出:“许多人学了几个字母,有电脑有软件有本字典,就好像可以做翻译了。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对译者的要求非常高。”作为同行,袁莉补充道:“要起码具备用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外文和中文功底都要非常好,兼具文学修养、知识面、悟性和才情,甚至还要几分灵性,所以好的译者特别稀有。”他们没有好意思道破的是,有些同行拿到项目后

分包给学生,导致一本书里人名都可能对不齐;一些所谓的“专业”翻译家要靠一天翻译 3000 字,一年完成十本书的产量来维持生计,和草婴先生一天只翻译 1000 字比起来,质量可想而知。

黄昱宁给记者举例说:“《性本恶》是美国大作家托马斯·品钦的作品,品钦的书一直都是天书级别的,一般人基本上都很难看懂,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但汉松为了把它带给中国读者,花费大量精力在这上面。”但这样的坚守,并不容易。

译者环境差

坚守难,一方面是因为稿费实在不高。目前出版社能够给出的翻译稿酬,一般千字不超过百元,“这个价码和我们家雇的打扫卫生的钟点工差不多,但有一个区别是,钟点工拿到的钱不缴税,但我们拿到的稿费还要交付 20% 的税。”作为一

个战斗在第一线的翻译工作者,朱振武说出了大家的委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由于靠文学翻译很难养家糊口,我们不得不做些别的事情养活自己。比如很多翻译工作者是在高校工作的,但翻译作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算作学术成果,也就不进入各种评价体系。”黄昱宁也说,以她的接触,“好像只有大连外国语大学明确鼓励教师翻译”。

除了最现实的生计问题,还有整个社会的认可,“翻译家的工作对社会的文化发展、繁荣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得到的回报,包括名望,都是远远不够的。”朱振武有几分抱怨地说,像草婴先生,花 20 年时间翻译托尔斯泰全集,这样一种付出,可能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如一个电影明星怀孕。在外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青年翻译家黄福海说,很多人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很大程度上也是希